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甜.布林克小说的传统复魅[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4):52-58.

布林克小说的传统复魅

张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一直以来为学者所关注。以布林克为代表的非洲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布林克小说为研究文本,结合作家回忆录,通过文本细读、文史互证和故事诗学的方法,挖掘小说中如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和民间故事讲述等口头传统的书写路径,可以揭示作家建构非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特质,突显作家个体生命的张扬,也能呈现作家担当非洲口头传统传承的当代使命。非洲作家回归传统的书写,有助于打破西方对非洲的单一叙事模式,从而建构非洲边缘群体的主体性。他们对传统资源的借用和回溯,超越了目的论范畴,彰显了本土化意义。

关键词:布林克小说;非洲魔幻现实;复魅传统

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4-0052-07

非洲各民族独立运动以来,非洲传统文化复兴趋势不断显现在社会公共事务和大众文化领域:2013 年非洲联盟通过《2063 年议程》,议程中设定的文化目标强调保护非洲文化多样性,提升文化软实力,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和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2019 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选后第一次公开演讲是由部族的唱诵诗人唱诗开场;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局大楼门口伫立着约鲁巴神话中的雷电神;全球非裔社群的诺莱坞电影中满溢着传统巫术、占卜和超自然力量。同时,复归传统的倾向也出现在非洲文学艺术领域。如非洲文学批评家阿比奥拉·伊莱勒所说,非洲书面文化具有一种审美上的传统色彩。^{[1](P58)}随着当代非洲文学的崛起,口头性成为以图图奥拉、阿契贝、索因卡和穆达为代表的非洲黑人作家创作模式中最重要的话语参照。他们强调并宣扬口头传统的功能和价值,展示了故事传统在当代书面文学中的延续方式和强大生命力。中外学界对他们作品中吸纳的非洲口头传统已有相关研究,但鲜有学者关

注非洲白人作家书写中对传统的复归。作为南非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南非白人书写中对传统的参照理应得到应有的探讨。

安德烈·菲利普斯·布林克(1935—2015)是南非著名的白人作家,也是一位自主自觉地将本土文化引入文学创作的典范作家。他一生的创作大体以 1959 年、1968 年和 1991 年为界发生过三次转型,历经四个阶段:探索阿非利卡传统文学的阶段,反叛阿非利卡传统文学的阶段,批判南非种族隔离现实的阶段,以及想象性重构南非历史的阶段。布林克近一半的小说创作集中在最后一个阶段。1994 年南非民主政府成立后,政府倡导传统文化复兴,作家们也回归非洲母体,“汲取创作灵感,寻求创作素材,利用手中的笔来参与新时代的文化复兴实践。书写非洲民俗成为一种反抗与赋权的文学策略”^[2]。南非的政治嬗变让布林克意识到,历史为作家们提供了一种最为丰富的沉默:这种沉默并非因为缺乏声音,而是白人主导的历史话语长期以来压制了许多其他

收稿日期:2024-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非英语小说民俗书写研究”(22BWW065)

作者简介:张甜(1989—),女,湖北黄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南非英语文学和非洲民间故事研究。

可能性。^{[3](P22)}而新时期的到来让探索南非故事成为可能,包括长期蛰存在布林克心中的文学诉求:非洲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非洲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南部非洲黑人口头文学中,这种魔幻现实已经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传统,它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并让作家们在过去与现在的交汇点上期待未来,愿意冒一切风险在世界的瞬息万变的火焰中舞蹈。阿非利卡传统中也存在类似的传统。回望阿非利卡人的口头传统,可以追溯到迁徙和巡回商贩在南非内陆的篝火旁讲述的鬼怪故事。^{[3](P26)}这些故事滋养了作家的幼年生活,形成了他心中的万千沟壑,待到时机成熟,便作出成熟乐章,回响着口头传统文化的雄浑之音,同时又激荡着现代艺术气息。

《沙漠随想》(1996)、《魔鬼山谷》(1998)和《祈祷的螳螂》(2005)是布林克创作生涯最后阶段的代表作,也是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相互契合的产物。这些小说将本土文化引入文学创作,给人一种新鲜的历史感。非洲民间故事具有一般民间故事瑰丽神奇的想象力与蕴意悠远的美学趣味。^[4]民间故事文学性的回归是故事诗学的新研究范式,为小说中关照非洲传统提供了可能,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与审美表征。通过分析布林克书写中非洲口头传统的文化表征、建构及其背后的历史宿命和意义,可以发现,布林克对传统的复魅突显了作家个体生命的充分激昂,也彰显了他作为南非作家所承担的历史文化责任。这有助于打破西方对非洲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单一叙事,为非洲历史中的沉默群体发声,建构非洲边缘群体的主体性意识。同时也可以发现,非洲作家对于传统的引用和回溯不是目的论的,而是一种回到非洲传统文本本身,反思和内化本土文化的过程。

一、口头传统与布林克小说

在文字出现以前,讲故事曾是非洲人民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言说方式。直至今日,讲故事仍是非洲人民维护部落和家庭传统文化,传递及交流经验的方式。随着当代非洲文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非洲作家开始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受到关注,其写作中对传统的复归,成为当代非洲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布林克是一位坚守本土文化立场的作家。他的创作实践,尤其是新南非成立之后的小说呈现出本土叙事和历史的交叠。但作为阿非利卡人,布林克是如何将文艺实践与非洲传统相结合的呢?弗洛伊德

说:现时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现在从这个记忆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展示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5](P36)}布林克在后期创作中将口述传统与书面文学相融合,这一实践与他的成长背景及其将南非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紧密相关。

布林克出生在南非自由省北部的弗雷德镇,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治安法官,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人都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布林克自幼便沉浸在经典文学中,这为他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打下了基础。^{[6](代译序P2)}此外,布林克从小就深受本土口头传统的影响。作为一个阿非利卡白人孩子,他是被黑人保姆带大的。在他的回忆录《岔路口》中,有一张布林克三岁时与黑人保姆艾娅的合影。他提到,正是这位保姆让他体会到了语言节奏的魅力。布林克很早就受到了非洲本土口头传统的深刻影响。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讲故事给我的世界带来奇迹,我生命中许多早期讲故事的人都是黑人,有带我长大的保姆,有朋友农场里的黑人男女,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童年时光。而且我认为这些故事以一种自然渗透的方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7](P115)}

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在国内外巨大抗议和压力下开始瓦解。1994年南非经历了政权更迭,民主政府成立,知识分子们经历了一阵痉挛似的兴奋,面对的却是更为混乱的社会现实。他们需要寻求新的文学表达方式,在文化冲突日益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实现社会和平与民族和解。南非文学批评家和作家恩加布鲁·恩德贝勒提出了“重新发现平凡”的文学观^{[8](P41~59)},旨在超越南非抗议文学的写作模式,发展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新文学。随着当代非洲文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非洲作家开始将非洲口头传统融入其文学作品中,强调并宣扬口头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展示了故事传统在当代书面文学中的延续方式和强大的生命力。^[9]

布林克将非洲口头传统建构在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作品中,以此对非洲本土文化进行多层次的逐步展现和多角度的交替审视,开始探索以下四个主题:一是审视那些在种族隔离期间被忽视和被禁止的历史;二是叩问两种形式的沉默——一种是在男性支配下被边缘化的女性所面临的沉默,另一种是在白人主导的历史叙述中弱势族裔所遭受的沉默;三是深入挖掘南非殖民主义历史及种族隔离时期遗

留的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问题；四是揭示南非社会在与黑暗过去和解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动荡与不安。这些书写指向，势必会将非洲口头传统带到读者眼前。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前，布林克的写作聚焦于南非社会的暴力制约关系、政治境况的嬗变和历史的创伤性变迁。该制度结束后，在后现代主义和南非本土文学创作土壤的滋养下，布林克开始享受更多的自由气息。他曾表示自己“对非洲的‘神话现实主义’一直抱有浓厚兴趣，这种风格是完全本土化的，根植于非洲的口头叙事传统。”^{[7](P115)}随着南非民主政府的成立，“恢复南非人民未来感的希望毫无疑问促使许多作家将笔触转向了南非的过去，他们通过目前已授权的或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语篇，去找回抛却的记忆，找回被抑制了的感情，找回被制止了的声音”^{[10](P42)}。

非洲民间故事的世界绚丽多彩，融汇了非洲各民族长期以来积聚的教化、智慧和经验，也是非洲人民想象的拓展。尽管白人作家布林克从小生活在阿非利卡社区，但他的心田仍然深受非洲本土文化的浸润。他乞灵于过往的辉煌，以拥抱当下的变化和敞开性，通过想象性的重构来抚慰南非历史的伤痕，并探索与审视种族隔离时期被忽视和禁止的言说。

二、复魅的传统与异化的现实

非洲口头传统凝聚了非洲人的历史经验、文化遗产和对世界的认知，是当代非洲人追寻自身之存在，理解自身之现状的元点。历史上，欧洲殖民者曾对非洲进行了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这对非洲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部落文化机制和非洲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殖民历史给南非留下的最可怕的伤疤是种族隔离制度。它是一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种族压迫和剥削体制。^[11]这种制度的“天才”在于它煽动不同种族间的敌对和仇恨，如此，南非种族主义政府能更方便地管理和统治这个国家了。此外，种族隔离制度加剧了各种族群内的性别压迫。布林克曾说：“除了种族压迫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当今的南非，迫害女性的事件无论是在黑人社区，还是在白人社区或者印度人社区，都还时有发生，这类事件从来就没有断过，而迫害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这使我始终难以释怀。”^{[6](代译序P6)}这种压迫的意识形态扎根得越深，思想环境就越贫瘠，人们就越迫切要求助于传统资源以充实其精神。在小说创作中，布林克融入了故

事讲述、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以及非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等本土传统，复魅传统文化的同时强化了小说的历史维度，弥补了边缘群体在历史主导叙事中的缺失。这种努力亦可以解读为对异化现实的反抗和消解。

故事，携带着先人的记忆和力量，为饱受苦难的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持。布林克的小说《祈祷的螳螂》中，穿插了非洲民间故事、叙事传统和祖先崇拜等元素。这赋予了作品浓厚的非洲传统文化色彩。《祈祷的螳螂》讲述了黑人奴隶库比多从虔诚的科萨族信徒皈依基督教，成为英国内陆传教士的故事。然而，接踵而至的厄运最终使库比多放弃基督教，重新回到了科萨族文化的怀抱。小说开篇，主人公库比多的母亲本是非洲内陆的科萨族人，不幸被布尔人（现南非阿非利卡人的前称）捕获，成为农场奴隶。她曾无数次尝试逃跑，都被抓回遭到痛打。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三重压迫使库比多的母亲喘不过气来，在异化的现实中，她转向故事寻求生存的勇气。她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每当人们经过她的棚屋时，总能听到她与他人的对话——她能独自扮演多个故事角色。更为神奇的是，传说她的儿子库比多并非生自她的子宫，而是诞生于她所讲述的故事。故事给了她生活的希望，故事给了她孩子，故事是她奴隶生活暗夜里唯一的星光。

库比多的母亲因其出生时的神迹，预言库比多以后会走出白人的农场，成为自由人。看到儿子身上新伤频增，深知白人主人的残酷，她不会追问儿子伤从何来，而是给他讲雄鹰的故事，暗示库比多不是白人农场的走鸡，而是雄鹰。她希望儿子能够超越现实的困顿，有朝一日能离开白人农场，前往更广阔的世界。她甚至预见儿子长出翅膀，带她一同逃离农场。^{[12](P12)}“故事是我们的向导；没有故事，我们便成为瞎子。……确切地说，是故事拥有并指导我们。”^{[13](P148)}母亲在故事中带库比多走进科萨族丰富多彩的过去，走进祖先充满幻想的世界。故事成为母子俩对抗悲惨的奴隶生活的力量。

民间故事具有集体流传和家族传承的特征。故事主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环境中传承，通常由长辈向子女或晚辈讲述，具有世代相传和家族遗传的特点。在布林克的书写中，故事讲述对于小说人物而言不但是延续个体生命的方式，也是延续族群生命的途径。《沙漠随想》叙述了南非白人女性克里斯汀从伦敦返回南非，探望临终的祖母，并在祖母家族女性故事中获取重新面对南非的勇气，最终她选择

留在南非,继续书写家族女性的故事。作为家族故事传承人,克里斯汀在祖母弥留之际听祖母讲述祖上女性的故事。这些女性是伟大的,她们肩负家族使命,砥砺前行;这些女性也是卑微的,她们无一例外被时代的洪荒所淹没。蕾切尔——曾祖母,她拥有卓越的艺术天赋,却因叛逆的性格被视为异类,遭受了终身的孤立;彼得罗内拉——克里斯汀的高祖母,在布尔人“大迁徙”期间曾领导族人进行了殊死搏斗,但她的事迹并未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录。“故事可以是个体内心的密码,也可以是群体信念的表达。”^{[14](P10)} 祖辈的女性们仿佛在祖母曲折有致的语言肌理里活了过来。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在历史书籍中无法找到的呼吸空间和观察角度。^{[15](P1~7)} 在布林克的书写中,祖母试图用祖辈女性的故事与历史中的男性主导叙事相互交织,挖掘历史的“下面”或者历史的“后面”^{[16](P4~5)},填补女性在历史中的空白与沉默,为那些终极沉默的她者(逝者)发声。

布林克在《审问沉默:南非文学面临的新可能性》一文中指出:“非洲有一种独特的魔幻现实主义,可以向世界展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际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P26)} 这种生者与死者共存的理念是万物有灵论的核心信条之一。该理论是由英国牛津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泰勒于 1871 年提出并阐述的。^[17]在泰勒看来,万物有灵论有两个信条:其一,生物的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其二,灵性广泛存在于非人的物中,并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今生来世的生活。^{[18](P350)}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分布着数千个民族,尽管他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传统信仰,但普遍信奉万物有灵论,这主要体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然物的信仰上。哈利·格鲁巴在其文章《泛灵唯物主义初探》中提到“泛灵无意识”/“泛灵唯物论”的概念,用以指涉非洲书写、思想、信仰、政治和文化实践方面持续不断的“复魅”倾向。^{[19](P261~285)} 这种倾向是布林克小说《魔鬼山谷》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部小说以犯罪记者弗利普·洛克纳探访魔谷及其历史为叙事线索,记述了一个从大迁徙中分裂出来的阿非利卡社区在偏僻的山谷定居下来,施行严苛极权统治的故事。种族隔离制度和性别压制盛行带来了魔谷恐怖的政治氛围和社区的病态无序。魔谷里自然环境恶劣,疮痍满目,道德沦丧,南非社会的丑陋在这里达到了极致。山谷中雷米尔特家族一百多年来统治魔谷社区,家族的始祖卢卡斯先知从坟墓中复活,与生者共存。死者复生,与子孙后代一起维护在魔谷的极权统治,推行极

端种族隔离,压制女性,确保魔谷“秩序井然”。^[20] 这些内容无不在隐射种族隔离制度时期的南非。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南非一代又一代白人以此确保祖先的制度得到实施。祖先已作古,但其影响却无处不在,继续荼毒生者。布林克在《魔鬼山谷》中揭露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恶托邦的丑陋,表达了作者对异化现实的批判。

祖先崇拜是非洲传统的信仰,影响并塑造了非洲人的精神世界。他们相信:人死后会进入一个精灵的世界,在那里,个人和他的家庭、部落会继续成为一体。在非洲传统宗教中,没有关于天堂、地狱的观念。非洲本土人相信这个世界是由生者、逝者、以后的人组成的。死去的人们在精灵世界中也像现在的部落那样组织起来。死去的祖先能够保佑其后裔。^[21]《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祖母每晚都会去后院祖先墓前与逝者聊天,问候逝者,分享每日见闻,听取祖先的教诲,学习祖先的智慧,以对抗现实的破破烂烂。^{[22](P39)} “在非洲民间故事中,生与死没有绝对的时空界限,二者是可以彼此对话……逝者似乎只是暂时离开那个曾生活过的世界,故事还在延续,因为他还会回来继续未完成的事情。”^[23] 在《祈祷的螳螂》中黑奴库比多出生时经历了死而复生的奇迹,随后他的母亲带他到象征科萨族神灵黑西伊比卜的石堆祈福。石堆象征着科萨人的精神共同体。“任何经过这样石堆的人,都要在其上放置一块石头,以此成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一部分,并与黑西伊比卜的生死循环相融合。”^{[12](P10)} 死者世界同活人世界之间的自由互动,生者与死者,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书写都印证了,在非洲传统信仰中,人的生命是环形循环的。人去世以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即祖先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共存。逝者虽然属于过去,但过去不应该被当作历史的垃圾桶弃之不顾。非洲的历史是不眠的,逝者不死,借助祖先的智慧,他们能够抵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重建本民族在历史上失去的主体性。布林克的传统书写旨在表明,作家肩负的任务,是让人民成为非洲文学与文化的主体。^[24]

民间故事是多样性的、活态和开放的,它们不断吸收外界的影响而生长、变形,永远不会完结。而小说是静态的、封闭的,在完成创作的一刻“作者已死”,文本永远在单向度无声地向读者宣告一切。非洲小说中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的创造性结合,为小说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并给予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读布林克小说,仿佛置身于一个魔幻的世界。

《祈祷的螳螂》中,库比多母亲无法逃脱做奴隶的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儿子。她在幻象中看到库比多在非洲广阔的大草原飞行,自由翱翔。^{[12](P11~12)} 飞人传说在非洲口头传统中具有深远的影响。飞翔不仅是个人自由,还意味着黑人文化价值观回归家园。再如,在《沙漠随想》中,克里斯汀家族中的历代女性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自然能力:克里斯汀的曾祖母蕾切尔,虽被视为异类遭到父母幽禁,却拥有卓越的艺术禀赋^{[22](P89)};高祖母彼得罗内拉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和超乎常人的预言能力^{[22](P100)};而更为远古的祖先卡玛,据说能与鸟兽虫鱼沟通,且能随心所欲地消失在沙漠之中^{[22](P182)}。在布林克的笔下,她们作为南非历史和现实中被边缘的群体,被赋予超自然能力,突破了现实的禁锢和异化。

万物有灵论还体现在将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物体视为具有生命的人,认为自然物也是有生气的智能存在。非洲科萨人认为户外的螳螂是带来好运的神赐之物,视其为具有神性的存在。纵观《祈祷的螳螂》这部小说,螳螂的意象贯穿始末。库比多出生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下葬时,一只巨大的螳螂出现在裹尸布上,随后库比多奇迹般地复活了。母亲认为螳螂给儿子带来了好运,预示他长大后走出白人的农场,成为自由人;^{[12](P9)} 当库比多对是否随白人旅行家离开农场犹豫不决时,螳螂的出现坚定了他离去的决心;^{[12](P52)} 后来,在经历了宗教和人生的磨难后,库比多回归了科萨的传统信仰,并再次见到了象征着欢迎他回归的螳螂^{[12](P273)}。螳螂是具有人格与生气的存在,是科萨人的精神寄托。《魔鬼山谷》里历代女性的遭遇可谓一部炸裂志。例如卡塔琳娜,她是被魔谷集权者从父母身边偷来的女孩,她在月圆之夜会变成白色山羊,从烟囷里飞出去,以逃避男权的蹂躏。^{[20](P133)} 在《沙漠随想》中,鸟的意象频频出现。祖母的老房子被称为“鸟巢”^{[22](P9)},祖母相信鸟儿是死去女性的灵魂,而且可以幻化成其他事物。^{[22](P237)} 布林克曾表示,在创作《沙漠随想》时,他并不完全理解为何频繁描写鸟儿,它们仿佛自然而然地飞入了故事之中。后来通过阅读,他发现鸟往往象征着女性气质,女性经验的维度。幻想表达了我们缺乏的东西,或者我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的东西,所以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失,而缺失的东西,是被淹没的被压抑了很久的经验维度。^{[7](P114)} 女性变成鸟儿,便可以自由自在,超越现实的困厄。布林克帮助神话边缘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冲破现实生活的藩篱,成为生命的主宰者。尽

管这些片段并未直接包含民间故事的文本内容,但改造了小说的文化肌理,将历史、文本与现实进行焊接,建构了小说的政治功能。

三、口头传统进入非洲小说的意义

非洲文学书写中传统的复魅是传统形式的现代演变。作家在现代小说中重现并探索口头传统,充分向世界展示了非洲口头传统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体现了他们抵抗西方殖民话语,建立边缘群体的主体性的努力。另外,口头性与书面性的结合也是一种叙事思维和框架的先锋性的实验。这种先锋实验不仅顺应了非洲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也适应了非洲新时代民族融合的新要求。更为关键的是,非洲作家对传统的引用和回溯并非出于目的论,而是体现了对本土化的价值及其知识创造的复杂性的深刻理解与反思。

西方世界对非洲的叙事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危险的单一故事讲述倾向,这种单一的故事讲述源于西方对非洲长期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非洲口头传统的采录与研究并不始于 20 世纪末非洲作家文学中的吸纳。早在 19 世纪,西方学者就开始考察和研究非洲本土文化,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发掘和传播非洲文化,而是为了了解本土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便制订适合殖民的政策。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曾指出:“西方文化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始终把殖民地的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的能力的。”^{[23](P22)} 的确,西方殖民在非洲留下的语言遗产和历史问题推动了非洲现代文学的生成^[26],但西方书面叙事却对非洲口头叙事进行压制和消声,并产生了关于非洲的单一故事:非洲是一片被遗弃的、没有文化的荒原,非洲人是野蛮、无知、愚昧、贪婪的。^[9] 非洲叙事遭到贬低和矮化,单一叙事遮蔽了其他非洲故事的可能性。此外,西方学者将口头文学置于书面文学的对立面,将非洲文学中的口头传统视为一种幼稚、天真的文学形式,或者是为欧洲语言注入活力的装饰品。^[27] 非洲人引以为傲的口头传统被践踏被遮蔽。尼日利亚第三代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奇玛曼达·阿迪奇在 2009 年著名的 TED 演讲中警告说:“让一个故事成为唯一的故事,是存在很大危险的。单一的故事形成僵化的印象,限制想象,并最终限制了整个世界。”^[28]

西方对非洲的单一故事之所以危险,还在于其将故事本质化,导致非洲以外的世界错误地将这种叙述视为唯一真实的非洲。非洲文学作品中口头文

学与书面文学的高度融合,打破了西方对非洲的单一故事叙述,向全世界展示了非洲口头传统的迷人魅力,以及非洲故事的多样性、活力和开放性。近年来,非洲小说在国际文学大奖中屡获殊荣,其影响力和认可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不断提升。这些足以证明:口头传统在拓展人类表述和沟通交流方式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非洲作家坚守文化之根,在作品中复归非洲传统,帮助边缘群体在现实中重建主体性,使得口头传统成为一种赋权体系,让传统替“我”在当下说话。

在非洲当代小说中,故事的融入使叙事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界限,开辟了一种新型的、开放包容的民族共存模式。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以阿非利卡人为代表的南非白人陷入了空前的身份危机:他们是殖民者后代,成为南非有色人种仇视的对象,面临着历史清算;当他们逃往西方白人世界后,又被当作外来者,处于异质文化的夹缝中。在小说《恐怖行动》(1991)中,布林克探讨了阿非利卡人的身份问题。小说叙述了阿非利卡人托马斯如何发现阿非利卡民族的历史遗产与南非黑人的共同根源,并最终将自己定义成为一名“非洲本土人”的故事。作为阿非利卡人,布林克在小说中巧妙地融入了非洲口头传统,为这一群体提供了与南非本土文化紧密相连的机会,同时也对阿非利卡人民进行了再教育。这一做法旨在加强阿非利卡民族对非洲的归属感,消除不同民族间的隔阂,促进族群间的融合与认同。

复归传统的审美趋势不仅与非洲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相契合,也适应了非洲新时代的需求。通过以上小说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观察到非洲现代小说中口头性与书面性的融合主要体现在魔幻叙事的运用上。神秘魔幻元素在非洲小说中是一种显性存在。当然,提及“魔幻”一词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源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些学者甚至认为非洲“魔幻现实”文学受到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但翻开历史的篇章,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拉丁美洲的文明绚丽多彩,是多种文明相互融合的结果,其中就有非洲文明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中回忆道:“一九七八年,安哥拉之行。当我踏上非洲大陆,一闻到那里的空气,我就骤然感到回到了童年时代的世界……加勒比的历史充满了魔幻色彩,这种魔幻色彩是黑奴从他们非洲老家带来的,也是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的海盗们带来的。”^{[29](P65~66)}除了黑奴贸易,实际上在拉美玛雅文化之前,拉丁美洲还存在着奥尔梅克文化,而奥尔梅

克人据信是源自非洲的黑人民族。布林克也曾指出:“非洲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完全本土化的流派,自从非洲有了讲故事的文学形式起,它就一直存在。”^{[7](P115)}历史上,非洲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其魔幻现实主要源自宗教信仰、本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习俗等,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2]

再者,文学的内在发展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每位重要的作家都参与塑造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他们在不自觉中继承并发展这一传统,而文学传统本身也在作家们的持续创作中形成了具有独特特质的文体风格。文学发展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任何杰出的诗人、作家都不能离开民间文学,都要从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宝库中吸取刚健清新的有益养料,才能创作出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作品。因此,非洲作家深入挖掘非洲本土历史的纵深,这不仅符合非洲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也是文学传统长远脉络的延续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非洲作家在作品中对传统的引用和回溯超越了单纯的工具论,体现了对本土化意义和本土知识生产复杂性的深刻内化与反思。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化和日趋紧迫的生存危机,当代非洲作家借助传统找到了与新的语境对话的方式;然而,传统不仅仅是作家用来反抗西方现代话语的工具,因为单纯将口头传统视为工具实际上掩盖了其本土意义和本土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忽略了多元文化知识的生产机制。非洲许多地方长期以来依靠口头传说保留民族历史和传统,社会生活实践也有非常明显的传统主义倾向。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文本世界和国家管理的叙事中,它还因历史的影响和传统的传承,自然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成为非洲人民的“人伦日用”,甚至也深刻影响到殖民者后代,如布林克笔下阿非利卡社区的生活,因此,传统融入非洲作家的书写也是水到渠成的。文学中传统的复魅,反过来也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生活及其符号意义的解读方式,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普遍艺术实践的一部分,传统复魅并不依赖于超自然的“怪力乱神”,相反,“传统在遭遇现代性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演变,提供了反思与适应现实的动力和契机”^[27]。

所以,非洲作家在书写中引用和回溯口头传统不是知识分子的话语论调,而是将传统资源看作处理与西方文化之间张力的多义空间。口头传统不是非洲现代文学的附属装饰,而是非洲民族历史层叠

交织的体现,是一种自然而为的存在。在这个日益去欧洲中心化的时代,非洲作家回归非洲传统文本,厘清非洲文学的根源与流变,能帮助我们在解读非洲文学及其批评视域上,摆脱西方学者既有的后殖民主义批评框架。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布林克小说中对口头传统的复归,揭示了作家创作背后的驱动机制以及非洲文学为人们提供的反思与适应现实的动力。作为南非白人作家,布林克坚信非洲文学具有再生的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不仅能摆脱种族隔离的枷锁,给予人们重新审视历史和改变现状的勇气,也为建立新南非提供了可能性。布林克等非洲作家珍视口头传统,吸纳并借鉴传统,使更多读者得以领略非洲本土文化的丰富多彩,从而开启了非洲小说的先锋性实验。此外,我们认识到,传统复魅并非简单地回归过去或恢复原始的生活信仰,而是在传统中探寻先人智慧,以消解现实中的异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作实践超越了西方精英阶层的文化寻根模式,打破了西方式非洲单一叙事的框架,弥合了文化与政治的裂痕,开辟了指向现实的新途径。

书面文学对口头性价值的发掘、借鉴和创造性发展,并非仅见于非洲作家,在中国作家如莫言、张炜、张大春的书写和艺术实践中,也存在着口头性与书面性之间的深度融合。非洲作家利用传统的能动性,发挥了传统作为协调机制的社会功能,对于我们如何反诸自身,重续我们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参考文献:

[1]F.Abiola Irele.The African Imagination:Literature in Africa and the Black Diaspor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胡忠青.扎克斯·穆达小说民俗书写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1.

[3]André Brink.Interrogating Silence:New Possibilities Faced by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J].South Africa:Literature, Apartheid and Democracy,1970—1995,Cambridge:Cambridge UP,1998.

[4]孙正国.故事诗学的学科语境及其理论建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

[5](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6](南非)安德烈·布林克.小说的语言和叙事:从塞万提斯到卡尔

维诺[M].汪洪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Felicity Wood.Interview with André Brink (Cape Town, July 1999)[J].English Academy Review: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1999.

[8]Njabulo S.Ndebele.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Rediscovery of the Ordinary[M].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

[9]段静,刘鑫.论钦努阿·阿契贝和奇玛曼达·阿迪奇小说中的非洲故事传统[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10](南非)康维尔,克劳普,麦克肯基.哥伦比亚南非英语文学导读(1945—)[M].蔡圣勤,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11]余建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兴废[J].史林,1997(2).

[12]André Brink.Praying Mantis[M].London:Vintage,2006.

[13](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荒原蚁丘[M].朱世达,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14]董天琦.讲了100万次的故事·非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15]Luo,L. G.Interview with Prof.Elizabeth Alexander[J].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2011(5).

[16]Robin,S. S. & J. Kitchen.Riding That Current as Far as It'll Take You[G]//Earl G.Ingersoll(ed.).Conversation with Rita Dov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3.

[17]杜树海.西方人类学界万物有灵论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23(5).

[18](英)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Harry Garuba.Explorations in Animist Materialism:Notes on Reading/Writing Af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ety[J].Public Culture 15.2(2003).

[20]André Brink. Devil's Valley[M].Fort Washington:Harvest Book,2001.

[21]吴明.非洲的传统宗教[J].世界宗教文化,1980(3).

[22]André Brink.Imaginations of Sand[M].San Diego: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

[23]李蓓蕾.非洲民间故事的文学言说与存在反思[J].山东外语教学,2023(6).

[24]Harry Garuba.Teacherly Texts:Imagining Futures in Nuruddin Farah's Past Imperfect Trilogy[J].Boundary 244.2,2017.

[25](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6]朱振武,李丹.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J].中国社会科学,2022(8).

[27]程莹.传统作为介入现实的方式——理解非洲现代书写与艺术实践中的“复魅”[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5).

[28]https://www.ted.com/talks/chimamanda_adichie_the_danger_of_a_single-story.

[29](哥伦比亚)西亚·马尔克斯,P. A.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林一安,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